

辜鸿铭《论语》英译的文化间性解读

张小曼, 范瑞瑞

(合肥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 间性关系以差异性为前提, 彼此相异的对象因互补而交互。文化间性主张不同文化通过对话展开交流, 达成共识; 翻译中的文化间性包含文化主体之间平等和谐的交互式对话, 文化主体在碰撞和交流中相互影响、相互融合。辜鸿铭的《论语》英译为中西方文化的沟通与对话提供了间性的文化场域, 双方就文化交叠与文化内在关联点建立联系, 达成共识, 实现文化共通; 以文化价值共识为核心, 吸收异质文化, 加以本土化改造, 使其积淀内化于自我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 实现文化整合; 在与其他者文化的融合中对源语文化进行丰富和拓展, 引导文化主体交互合作, 为彼此注入异质生机与活力, 最终实现文化新质与文化共生。

[关键词] 辜鸿铭; 《论语》; 文化间性; 文化交叠; 文化整合; 文化共生

[中图分类号] H 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4) 06-0076-08

一、引言

《论语》作为中华文化典籍之一, 文约意丰, 体现了儒家学派的生活方式、教育思想、政治主张、社会伦理和价值观念。儒家学派的主张对中华文明影响深远, 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可以说儒家文化构筑起中华文化的骨骼经脉, 因此, 中华文化的对外交流必然少不了《论语》的外译。《论语》至今已被英译60余次, 国内外学者对此的研究热情长盛不衰^{[1]61}, 而辜鸿铭英译的作品闻名欧洲^{[2]178}, 是中华文化西行的成功范例。因此, 研究辜鸿铭译本(以下简称辜译本)可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参考价值。

国外学者对辜译本的研究不多, 主要集中在翻译思想和翻译策略方面: Chan等提出辜译本在很多地方翻译得过于自由^[3]; Du认为辜译本是中国人意识形态的“自我表达”^[4]。国内对辜译本的研究成果丰硕, 主要集中在翻译策略、文化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等方面。(1)在翻译策略方面, 王静等认为辜鸿铭的翻译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操控^[5]; 黄碧蓉认为辜鸿铭的归化翻译能够让中西方读者进行互动^[6]。(2)在文化对翻译的影响研究方面, 王东波提出辜译本

充分实现了文化传播的翻译目的^[7]; 张小曼等提出翻译主体对话能够创造“同质语境”^[8]。(3)还有一些学者进行了对比研究, 如王建认为辜鸿铭和理雅各两人的翻译策略受到权力话语的制约^[9]; 吕鹏飞等使用语料库对辜译本和亚瑟·威利译本进行了翻译风格比较^[1]。可见, 学界对于辜译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策略和思想、文化传播和译本对比研究等方面, 还未涉及对译本的中西文化间性的探讨。文化间性为不同文化之间提供对话的场域, 也是文化进行平等交流的重要前提, 从文化间性角度研究辜译本对中华文化的传播具有重大价值与意义。

二、文化间性理论与翻译

文化间性发端于主体间性, 二者都主张动态的对话与交流^{[10]137}。主体间性最初发端于胡塞尔的现象学, 也称“交互主体性”。胡塞尔提出“他者是在沉思的自我中, 从我的意向性的根源处被构造出来, 自我和他者共处于一个客观世界的共同体中”^{[11]178}。他还指出主体之间的共识或知识的普遍性是通过人的“统觉”“同感”“移情”等方式达成的, 这涉及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12]6}。由此, 主体之间的“间性关系”开始凸

[收稿日期] 2023-09-26

[基金项目] 安徽省人文社科重点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大学英语融合研究”(SK2020A0798)

[作者简介] 张小曼(1969—), 女, 安徽念山人, 教授, 硕士, 主要从事翻译与英美文学研究。

显。海德格尔认为,世界是与人分享的,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13]138}。他提出了此在的共在问题,涉及本体论的主体间性问题^{[12]7}。马丁·布伯认为,存在是关系而非实体,本质上是一种“我一你”关系,这是本源性的关系^{[12]7}。马丁·布伯的关系论强调“我与你”并非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的关系,因此,主体间性的含义更为明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强调主体之间的互动,以达成彼此的共识。在交往行为中,互动行为本身取决于双方能否承认主体间性的前提,而另一个互动前提是语言媒介,它反映了主体自身与世界之间的关联。交互主体之间通过语言媒介达成一致,双方通过协商对共识的语境加以明确。交往双方必须承认和尊重主体间性和语言媒介,由此交互才能合理展开,在彼此共在的客观世界里建立联系,从而达成主体间的共识^{[14]115-138}。语言媒介传承文化价值,因此翻译必然是在文化层面上展开的,也只有文化属性得到重视,翻译的文化本质才能得到承认^{[15]73}。翻译可以被理解为跨越语言文化边界并建立起相互理解交流的活动^{[16]187},在这里翻译活动中的文化间性凸显出来。文化间性不同于“主体/客体”的哲学模式和“东方/西方”的世界秩序,强调“你—我”的主体关系以及两者之间关于“他性”的对话关系^{[10]137}。翻译活动为东西方文化的交互提供了路径支持,在“我与你”的交往中,文化逐渐突破原有的边界,在不同的文化主体之间流转融合,自我文化成为他者文化的一部分,他者文化逐渐包含在自我文化之中,最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格局,因此,进行翻译研究不能没有文化间性思维。

翻译的功能通过突出其跨文化维度,已经从单纯的语言转换转变为动态的文化表现,关涉两个文化体系之间的动态互动^{[17]465},这也是文化间性的基本要求。文化间性从主体间性发展而来,它要求各个文化主体之间具有平等的地位,使彼此的利弊在对方文化中得到真实的映射,文明互鉴,取长补短,如此获得双方文化的共同发展^{[18]11}。刘悦笛提出文化间性就是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最终达成文化整合。因此,文化交流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涉及各个文化主体之间持久双

向的交互。文化理解的前提是尊重他者文化的异质性,文化间的“异”能分殊^{[19]59-60}。文化异质性建构了自我与他者的身份差异,同时,差异让我们审视自我和认识他者。文化异质性是区别他者和体认自我的一种途径,通过这种方式,自我与他者的意义被建构了出来。间性关系都是以差异性为前提,因此,在彼此相异的对象之间才会发生交互作用式的对话关系^{[20]46}。自我与他者共处一个共在的文化客观世界,因此,异质并不意味着不可交流,而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丰富与创造。

文化间性强调文化主体之间动态、持久且双向的文化交际行为,因此,文化间的“同”构筑了文化主体之间持久双向的沟通平台,自我与他者通过文化之“同”打破横亘彼此之间的文化壁垒,就彼此的文化关联点进入对方的世界,与对方产生文化共鸣点,发生动态的、双向的交互,从而翻越文化的鸿沟建立起文化联系,最终实现文化交互的意义^{[20]45}。在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免不了会出现文化整合现象。文化是不断发展的,在螺旋式的发展过程中,文化碰撞与整合会转变为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在开放的文化环境下进一步丰富自我,从而推动文化的共生。辜译本存在着中西方两种文化的动态张力,译本是中西方文化共在的世界,译者通过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对翻译文本和翻译话语进行建构,最终实现平衡中西方文化的目的。译者的文化间性意识也在翻译过程中不自觉地扩大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从而促成中西方文化交互的成功以及双方共识的达成。在文化间性视域下,中西方文化在辜译本中实现了文化交融与文化共生。因此,从文化间性角度研究《论语》辜译本是非常有必要的。

三、文化交叠与《论语》英译

文化间性是对话之地,这要求不同文化主体之间尊重彼此差异,积极寻求文化共性,通过对话和合作构建平等的文化地位和文化格局,达成文化共识。在交往行为中,互动本身取决于双方能否承认主体间性的前提^{[14]138};而一种文化的间性特质,指向该文化与他者文化的内在关

联^{[20]46}。这个内在关联是中西方文化共有的部分,就是文化共性,即中西方文化交叠。中西方文化共性是两种文化建立对话关系的部分,是构筑双方交互的平台,中西方文化通过共性深入他者文化结构内部,在共有的世界中建立文化联系,实现文化间的有效交互。人都从自身时空出发理解世界^{[19]57},相近或相同的文化对译语读者来说更具熟悉感和亲和力,也更容易为译语读者所理解和接受,所以,交叠文化更容易被他者文化理解和接纳。接收文化一开始可能是怀疑或不热情的,接收过程也需要时间^{[21]304}。交叠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关联点,能够打破文化壁垒,缩短文化距离,使译本的文化话语和文化语境熟悉化,在文化交流中引起他者文化的共鸣与共情,从而迅速建立起一种文化上的共识与认可,实现文化上的共通与共享。

例1.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

Confucius remarked, “A young man, when at home, should be a good son; when out in the world, a good citizen. He should be circumspect and truthful. He should be sympathy with all men, but intimate with men of moral character.”^{[22]349}

辜鸿铭对“孝”“信”“仁”的翻译非常具体,贴合源语文化内涵,对译语读者和译语文化来说比较容易理解,因为西方文化也有这些概念,中西方存在文化交叠,这为中西方文化的沟通与合作提供了路径支持。辜鸿铭对“悌”和“爱”的阐释凸显了译者的主体性:“citizen”一词在西方政治概念中更强调一种身份,拥有这种身份的人要履行特定的义务,享受相应的权利。辜鸿铭的阐释无疑扩大了“悌”的概念范围,丰富了源语文化语境中的概念内涵,是具有创造性和时代特色的一种诠释,但又不违背其本来的文化语境。在这里,中西方文化的间性特质使二者展开了有效的交流并达成共识,这是因为在合作理解过程中,没有哪个主体能够垄断解释权^{[14]132},二者必须相互尊重,达成共识。辜鸿铭将“泛爱”译为“sympathy with”,译文有“同情、怜悯、体谅”之意,这是译者对“爱”的独特理解,他认为,泛爱众即指对大众要有怜悯同情之心^{[23]21}。“爱”是中西方文化共同追求

的价值取向,能够得到双方的接受与认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化的共通与共享。辜鸿铭对“爱”的阐释明确具体,符合西方文化语境的认知理解,但又不与源语文化语境矛盾,可以视为中华文化对西方文化发出的邀约,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交互主动性,减少了进入西方文化的阻力,中西方之间的文化交叠夯实了双方文化交互的基础,不断扩大文化的理解与互动维度,实现了中西方文化平等、和谐的有效性交互,达成了文化共识,实现了文化交流。文化交互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文化间性为文化交互提供了场域支持,文化交叠缩短了中西方之间的文化距离,使得文化交互更为顺畅,助力中华文化在西方世界中的传播与发展,进一步实现文化间的共通和共享。

主体间性哲学文化为文化间性提供了基础的理论前提,跨文化交流则为其提供了实践经验,与之相应的方法论则引导各文化主体进行异质对话。中西方文化在译本这个共在的世界里发生了文化交汇,二者积极寻求文化间的共性。跨文化交流的实践使彼此的文化观念突破民族和国家的边界,具有更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更和谐的文化秩序。辜鸿铭对原文本的解释是其努力平衡中西方话语力量和文化的结果,译文实现了中西方文化上的意义共通,中华文化进一步进入他者文化视域,共同探讨彼此文化结构的内在关联。虽然中西方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但其中蕴含的爱、忠诚和对美与道德等基本价值的追求是一致的,二者不谋而合,产生了文化认同心理,以价值共识为纽带建立起文化联系,这为中西方文化交互提供了价值指引。跨文化交流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求意义共相^{[10]137}。辜鸿铭运用语言媒介,用译文建构和重塑中华文化语境,中西方文化在译本中发生交汇,深入彼此的文化内部,增强了双向性文化交互的广度与深度,不停自我探寻契合对方文化价值的共性,所以,中西方的文化交叠建立在双方共有的价值基础之上。交叠的文化从自我流动到他者,在此过程中文化的感召力和创造力进一步提升,东西方文化共同分享文化价值,流转于自我和他者之间的文化共识也会增强文化的延续性和传承性,彼此的文化体系再次焕发新生,迎接下一场文化交流。

四、文化整合与《论语》英译

文化是不断变化和革新的, 自我文化和他者文化在双方尊重文化异质性和达成文化价值共识的基础上发生交互, 二者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对异质文化进行甄别、选择与新构, 形成文化间的互识和互补, 最终实现自我文化的丰富和多元文化的共存, 这就是文化整合。文化整合的前提是尊重文化异质性, 文化异质性使我们审视自我和认识他者, 有助于在间性的场域中促进自我对他者文化的理解, 文化异质性是文化整合的基础。翻译保存文化差异, 并让其彼此联系、渗透^[24]⁶⁹。文化具有流动性和互渗性, 它能够在间性的交互场所中从一方流动到另一方, 在互相理解的基础上发生文化互渗现象。自我文化和他者文化在文化价值上的共识是双方交互的重要媒介, 双方以文化价值共识为核心, 吸收异质文化中与自我文化具有共同认知和情感共鸣的核心文化要素, 将异质文化中的文化意象以本土化的方式进行改造和转化, 促成异质文化意义的重塑与再生, 使其符合自我文化语境并积淀内化于自我文化的内部深层结构之中, 完成异质文化的传承和自我文化的丰富与革新, 从而使文化交互主体实现共存并形成新的文化有机整体, 最终发挥出文化整合的潜力和有效性。

例2. 子谓子产, “有君子之道四焉: 其行己也恭, 其事上也敬, 其养民也惠, 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篇》)

Confucius remarked of a famous statesman (the Colbert of the time), saying: “He showed himself to be a good and wise man in four ways. In his conduct of himself he was earnest, and in serving the interests of his prince he was serious. In providing for the wants of the people, he was generous, and in dealing with them he was just.”^[22]³⁷⁷

辜鸿铭将“子产”翻译成“a famous statesman”, 并类比为法国的“Colbert”, 即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 法国历史上一位擅长经济并做出巨大贡献的政治家^[23]¹⁰⁴。译者运用译语文化中的相似人物类比原文中的历史人物, 这种方法使源语文化与译语

文化发生直接联系, 方便译语读者的理解, 使其从自身出发, 引发对他者文化的想象, 帮助译语读者跨越语言和文化鸿沟, 直接拉近两种文化的距离, 让读者以“宾至如归”的方式唤醒原有的文化记忆, 同时也方便了读者对译本的理解, 加深其对源语文化的认识, 这样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又一次发生了碰撞与融合。辜鸿铭将“恭”“敬”“惠”“义”分别翻译为“earnest”“serious”“generous”“just”, 其中“earnest”表明就子产的个人生活而言, 他是言行真挚的; “serious”表明就政治事务而言, 他是认真严肃的; “generous”表明就服务而言, 他是非常慷慨、心系人民的; “just”表明就对待人民的态度而言, 子产是公平正义的^[23]¹⁰⁴。在原文中, 子产是具备这4个方面条件的君子; 在译文中, 柯尔贝尔也是这样的君子, 辜鸿铭用译语刻画出一个真诚活泼又严肃庄重、心系民生又公平公正的政治家形象^[23]¹⁰⁴。辜鸿铭在译本中将君子之四道阐释得生动具体, 将原文的语言文化特质用地道的目标语表达习惯表达出来^[25]⁹⁴¹, 非常贴合他者文化语境, 再现原作内容又丰富了译语文化。就子产和柯尔贝尔而言, 两人的性格和能力肯定有差异, 但是两人的政治才能和对国家和人民的贡献是一致的, 双方达成了一种文化共识, 这是译者采用类比翻译的基础。子产的形象变得生动和立体, 一个鲜活的政治家形象跃然于译本之上, 随时准备与译语读者互动。同时, 儒家文化中的君子之道也被传入译语文化, 中西方文化产生了互补, 译文中柯尔贝尔的政治家形象也更加鲜明立体。在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共在的译本世界, 双方就文化共识展开交互, 在文化间性的空间中这两个文化主体接受并吸纳异质文化中与自我文化产生共鸣的文化要素, 以本土化方式进行文化再建构, 使其契合自我文化, 从而实现了文化之间的互识和互补。

任何沟通过程都发生在前理解的背景之上, 所以他者语境的明确与自身语境的明确是有一定距离的^[14]¹³²。因此, 文化交往主体双方首先必须尊重彼此的文化异质性, 然后展开交互沟通, 努力在双方的文化关联上对关键文化意义的理解产生一致和认同。为了沟通的顺利展开, 文化主体之间需要提炼具有认知一致和情感共鸣的文化

核心要素, 敲开文化交互之门, 为双方的文化交互之旅提供理解前提。儒家文化的思想理念构筑成了中华文化的根脉, 但是一些特定的儒家文化意象在译语文化中找不到相对应的术语, 难以在目标语中寻找相融的可能^{[26]93}。这在文化层面上表现出原作的抗译性, 在翻译过程中会增加译者的负担, 译者必须表现出卓越的翻译能力才能处理这些受文化限制的习惯表达和惯例^{[27]489-490}。辜鸿铭对部分文化意象采用了类比翻译法, 这是对译语文化缺失对等表达法的积极应对, 以尽可能保证源语文化在译文中文化意义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从整体上实现文化因素的意义重组和含义再现, 也给译语文化保留了参与文化解释的空间, 引导译语读者产生相应的联想并积极地参与交互, 深入领会儒家文化的丰富内涵。中西文化在译本的间际场域里参与交互, 文化不停地流转于交互主体之间, 双方交换文化要素, 就主体间文化的共性达成共识, 对于他者文化的异质部分, 取其精华并进行再建构, 通过文化整合机制使其沉淀内化为自我文化并形成新的文化有机体。中西方文化在译本的间性场域中呈现出一种文化整合的趋势, 实现了文化的互补性与延续性。

五、文化共生与《论语》英译

不同文化之间需要充分理解, 尊重彼此差异, 从而谋求共同繁荣^{[28]422}。文化间性场域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 文化主体在间性场域内通过商谈寻求共识, 在双方发生文化互动的过程中, 各个文化主体逐步积累共享的经验, 为彼此的进一步交互提供相应的参照点, 同时文化主体更加全面地了解自我与他者的异同, 彼此需要和相互沟通, 使文化主体相互取长补短和共同发展^{[29]149}。文化间性哲学本身体现了一种接受文化差异性的伦理^{[30]133}。有了文化异质性, 才有了源源不断与他者文化交互融合的不竭动力, 从而构建自我与他者交相辉映的积极互动关系^{[31]595}。翻译活动架构起文化主体之间沟通的桥梁, 深刻反映出自我与他者的关系, 具有伦理内涵与伦理目标^{[15]77}, 因此, 译者在建构翻译文本时应该为他者留出空间, 确保自我和他者的共生关系^{[32]121}, 尊重文化异质性, 接受文化差异,

主动地实现与他者的融合^{[15]78}。不同的文化在译本间性的场域中发生碰撞与融合, 在交互中重组了文化主体之间的文化元素和文化身份, 拓展了原作的域外新生命^{[15]77}, 在与他者文化的互鉴与融合中进一步对原作生命和源语文化进行丰富和拓展。文化主体在共存的基础上相互作用, 为文化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无限延长在他者文化中的生命力, 引导文化主体共同发展, 最终实现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的互利共生。

例3. 子曰: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逾矩。”(《论语·为政篇》)

Confucius remarked, “At fifteen I had made up my mind to give myself up to serious studies. At thirty I had formed my opinions and judgement. At forty I had no more doubts. At fifty I understood the truth in religion. At sixty I could understand whatever I heard without exertion. At seventy I could follow whatever my heart desired without transgressing the law.”^{[22]355}

辜鸿铭将“立”译为“formed my opinions and judgement”, 即“形成自己的观点与判断力”^{[23]39}; 而杨伯峻将“立”理解为“懂礼仪, 说话做事有把握”^{[33]13}。原文中特定的文化表达对译者的翻译能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而辜鸿铭的翻译简单、具体而明确, 既与原文文化内涵保持一致, 又符合译语读者的理解方式, 易于被他者文化所理解和接受。辜鸿铭将“天命”翻译为“the truth in religion”, 他将“天”理解为“宗教”, 指代宇宙的根本规律^{[23]39}。他认为儒家思想包含一整套系统的哲学、伦理体系和君子之道, 孔子将这一思想编撰成典并使之成为宗教——国教^{[22]49}, 所以在他看来, 儒家也是宗教的一种, 与基督教相似, 这两种不同的宗教体系是有共通点的, 可以以西释中, 用这种类比翻译的方法能够减少中华文化进入西方文化的阻力。

中西方文化因子在间性的场域中发生了交融与重组, 借着西方文化的外衣, 辜鸿铭的类比翻译减少了译文中的文化异质感和陌生感, 在可接受性的基础上使儒家理念系统完整地在译本中再现, 进而传递给西方读者, 进入到他者文化之中, 这是译者有意识地对中西方文化差异进行有

针对性的填补与黏合,使儒家文化能够在他者文化的环境中拥有长久存活的生命力。翻译可以被理解作为一种重新叙述的形式,用另一种语言构建原语言叙述的人物和事件,因为表达不是孤立的,它的意义来源于一定的语境,译者也必须作为互动的参与者加入到这种提示性的关系当中^{[14]160}。所以将文化异质性表达正常化是译者常常采用的一种策略,使译语读者能够根据自己的文化理解与故事产生联系^{[34]457},创造出能够唤起读者情感和文化认同的文化场域,译者直接使中西方文化发生联系,进而引导译语读者产生联想并积极地参与到文化交互中来,使得文化与文化之间能够被相互理解,从而实现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碰撞、交融与共生。

文化是通过时空变化而成为持续变化的有意义的创造活动,而不是作为一种形式或固定的结构,任何文化都是不断互相丰富的结果^{[35]749}。翻译探求在不同文化空间中构建共享认知模式的可能性^{[36]264};语言和文化是文学的核心,在翻译过程中也要转移到其他语言和文化媒介中,构成了文本的生态环境^{[37]29};翻译在不同文化之间的调解过程中发挥软作用^{[17]482},即使是异质文化,在翻译手段的协调下也能变得本土化或熟悉化^{[38]148}。这时译文充当了文化代理人,对语言、文学体裁和文学期望等文化要素进行修改并被其修改,从而产生新的思想和观念^{[37]30}。因为知识中介和知识翻译都受到接收文化语境的影响^{[21]317},译本不仅反映了特定的意识形态或世界观,还积极地塑造了周围的世界^{[38]149},所以译本是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交互的结果,中西方分化的语境在文化间性的场域中发生双向性的、持续的交互与融合。一部著作到另外的文化中会有一个新的生命,要适应新的语境和读者,需要不断成长,所以从译介到传播的过程,是生成的过程^{[39]90},文学的生命是靠语言的活动、言语的创造开创的^{[40]92}。辜鸿铭英译《论语》加剧了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论语》的意义在译者的阐释中不断得到“延异”,使《论语》的思想在循环对话中催生了文化新质,从而驱动了文化的内向继承和向外传播,呈现出中西方文化的互鉴与融合,推动译作在异域文化的接受与新生^{[8]92},真正从文化价值共生与共融的高度充

分把握文化译介的高层次目标与价值追求^{[41]132},完成源语文化在异域文化的丰富与拓展,中西方文化主体形成系统的、有机的文化整体,文化主体能够在他者文化的环境中拥有长久存活的生命力,最终实现文化的共在与共生。

六、结 语

文化异质性建构了自我与他者的身份差异,通过差异可以审视自我和认识他者,建构自我与他者的意义。间性关系以差异性为前提,彼此相异的对象因互补而交互。文化间性主张不同文化通过对话展开交流,达成共识。典籍翻译并非简单的语言置换,而是文化主体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翻译中的文化间性包含文化主体之间平等和谐的对话与交互,文化主体在碰撞和交流中相互影响、相互融合。译者的文化间性意识在翻译过程中不自觉地扩大自我文化和他者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促成中西方文化的交互与共识的达成。辜鸿铭的《论语》英译为中西方文化的交互与沟通提供了间性的文化场域,双方就文化交叠与文化内在关联点建立联系,达成共识,实现文化共通;以文化价值共识为核心,吸收异质文化,加以本土化改造,使其积淀内化于自身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实现文化整合;在与他者文化的交互与融合中对源语文化进行丰富和拓展,引导文化主体朝着文化共生的方向发展,为文化发展注入异质生机与活力,最终实现文化新质与文化共生。

典籍的外向译介只有真正系统性与完整地传递出原文本的文化内涵,文化主体在对话与交流的过程中达成共识,从而与异质文化发生交互与融合,源语文化的价值与意义才能被异质文化认可和接受,在他者文化的土壤中扎根新生,典籍外译才能真正地实现文化传播的目的,中华文化才能真正走出去、请进来。

[参考文献]

- [1] 吕鹏飞, 陈道胜. 基于语料库的《论语》英译本翻译风格比较研究: 以辜鸿铭和亚瑟·威利两译本为例 [J]. 上海翻译, 2021 (3): 61-65.
- [2] VAN DER LEEUW K L, WILHELM R. Missionar in China und vermittler chinesischen geistesguts. Schrift-

- enverzeichnis, katalog seiner chinesischen bibliothek, briefe von heinrich hackmann, briefe von Ku Hung - ming. Mit einem Beitrag von Thomas Zimmer (review) [J].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2010, 17 (1): 176 - 179.
- [3] CHAN W T, YUTANG L. The wisdom of confucius [J]. *Pacific Affairs*, 1940, 13 (4): 483 - 487.
- [4] DU, CHUMEL. Gu Hongming as a cultural amphibian; A confucian universalist critique of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 [J].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2011, 22 (4): 715 - 746.
- [5] 王静, 周平. 意识形态对辜鸿铭翻译的操控 [J]. *外语学刊*, 2010 (2): 124 - 127.
- [6] 黄碧蓉. “译”与“传”: 辜鸿铭儒经翻译论 [J]. *外语学刊*, 2016 (3): 102 - 106.
- [7] 王东波. 辜鸿铭《论语》翻译思想探析: 文化翻译的范例 [J]. *孔子研究*, 2011 (2): 121 - 126.
- [8] 张小曼, 孙晓璐. 辜鸿铭《论语》英译主体“同质语境”中的对话 [J]. *中国翻译*, 2022 (6): 87 - 94.
- [9] 王建. 权力话语视角下《论语》英译本的对比解读: 以辜鸿铭和理雅各的译本为例 [J]. *山东外语教学*, 2012 (4): 97 - 103.
- [10] 朱林. 从主体间性到文化间性: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跨文化写作的人类学观察 [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2 (3): 132 - 140.
- [11] 胡塞尔. 笛卡尔式的沉思 [M]. 张廷国, 译.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1.
- [12] 杨春时. 本体论的主体间性与美学建构 [J].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2): 5 - 10.
- [13]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 [M]. 陈嘉映, 王庆节,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
- [14] 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 第1卷 [M]. 曹卫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 [15] 刘云虹. 对话与共生: 试析许钧关于中华文化译介的思考 [J]. *外国语*, 2022 (4): 72 - 80.
- [16] 张滢洁, 任文. 翻译与文化: 从文化间性到转文化性 [J]. *社会科学研究*, 2022 (6): 181 - 189.
- [17] WU YOU. Globalization, translation and soft power: A Chinese Perspective [J]. *Babel*, 2017, 63 (4): 463 - 485.
- [18] 胡作友, 钟莎莉. 翻译距离与动态调整 [J]. *中国翻译*, 2022 (4): 5 - 12.
- [19] 刘悦笛. 中国人文科学的“自创性”: 以文化间性以柔克刚 [J]. *文艺理论研究*, 2015 (1): 56 - 61.
- [20] 王才勇. 文化间性问题论要 [J]. *江西社会科学*, 2007 (4): 43 - 48.
- [21] TANG J. A macroscopic perspective on translation of knowledge in China [J]. *Babel*, 2017, 63 (3): 303 - 321.
- [22] 辜鸿铭. 辜鸿铭文集: 下 [M]. 黄兴涛, 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6.
- [23] 辜鸿铭, 王京涛. 辜鸿铭英译经典: 论语 [M]. 中英双语评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 [24] 胡开宝. 对话与多元: 试析许钧翻译文化观点的特征、内涵与意义 [J]. *中国翻译*, 2021 (6): 68 - 73.
- [25] 谭载喜. 翻译的界、两界与多界: 一个关于翻译的界学阐释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1 (6): 937 - 947.
- [26] 许钧. 关于文学翻译的语言问题 [J]. *外国语*, 2021 (1): 91 - 98.
- [27] SAEED A T. Impact of mother culture o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culture - specific idioms [J]. *Babel*, 2017, 63 (4): 486 - 505.
- [28] 许钧. 翻译史研究的任务: 基于《不平等与不对等》的思考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3 (3): 420 - 429.
- [29] 戴晓东. 解读跨文化认同的四种视角 [J]. *学术研究*, 2013 (9): 144 - 151.
- [30] LAU K. Whither intercultural philosophy? responses to comments and questions on phenomenology and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 Toward a new cultural flesh [J]. *Dao*, 2019, 18 (1): 127 - 136.
- [31] 刘云虹. 文学翻译生成中译者的主体化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2 (4): 590 - 599.
- [32] ZHANG F, LIU H W. Translation as citation: Zhuangzi inside out [J]. *Translation Studies*, 2021, 14 (1): 121 - 123.
- [33] 杨伯峻. 论语译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34] BECKER A, ASANO-CAVANAGH Y, ZHANG G. Cultural adaptations translating politeness from Japanese to English [J]. *Babel*, 2020, 66 (3): 457 - 483.
- [35] HAYE A, GONZALEZ R. Dialogic borders: Interculturality from Vološinov and Bakhtin [J]. *Theory & Psychology*, 2020, 31 (5): 746 - 762.
- [36] 王晓路. 论翻译的历史文化功能: 认知模式与知识谱系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1 (2): 263 - 272.
- [37] AKSOY N B. Insights into a new paradigm in translation Eco - translation and its reflections [J]. *Babel*, 2020, 66 (1): 29 - 45.
- [38] KOSKINEN K. Shared culture? Reflections on recent trend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J]. *Target*, 2004, 16 (1): 143 - 156.
- [39] 刘巧玲, 许钧. 如何拓展翻译研究视野: 许钧教授访谈录 [J]. *中国翻译*, 2021 (2): 87 - 93.

[40] 许钧. 外语、异质与新生命的萌发: 关于翻译对异质性的处理 [J]. 外国语文研究, 2020 (1): 88 - 94.

[41] 高乾, 裘禾敏. 中国文化外译与国家翻译实践 [J]. 中国翻译, 2022 (4): 129 - 132.

On Ku Hungming'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Luny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cultural Interpretation

ZHANG Xiaoman, FAN Ruiru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Inter-relationships are based on differences, and objects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interact due to complementarity. Interculturality advocates communication and consensus among different cultures through dialogue; interculturality in translation involves equal and harmonious interactive dialogue between cultural subjects, which influence and integrate with each other in collisions and exchanges. Ku Hungming'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Lunyu* provides an inter-cultural field for the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The two sides establish contacts on cultural overlap and cultural internal correlation, reach consensus, and achieve cultural commonality; with the cultural value consensus as the core, they absorb heterogeneous cultures and conduct local transformation, so that their accumulation can be internalized in the deep structure of self-culture,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can be realized; by enriching and expanding the source language culture through integration with other cultures, as well as guiding cultural subjects to interact and cooperate, they inject heterogeneous vitality into each other, and ultimately achieve new cultural quality and cultural coexistence.

Key words: Ku Hungming; *Lunyu*; interculturality; cultural overlap; cultural integration; cultural coexistence

(责任编辑 张永汀)

(上接第 33 页)

Cultural Value, Development Problems and Breakthrough Paths of the Documentary Production on the Them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UN Liq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Leshan Normal University, Yeshan 614000, China)

Abstract: The production of documentaries on the them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has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image memory space for ICH, inherited and spread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cultivated and strengthened the groups of ICH projects. However, it faces such problems as the lack of comprehensive displays of ICH projects, insufficient use of younger-oriented expression strategies, obstacle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onstraints in market distribution. To further improve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documentaries on the theme of ICH, promote ICH inheritance and dissemination, enhance the cultur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improve the dissemination power and influe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we should form multiple production subjects for documentaries on the theme of ICH, apply younger-oriented expression strategies, comprehensively display the essence of ICH projects, promot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documentaries, and achieve diversified promo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documentaries.

Key words: ICH; documentary; image memory;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younger-oriented expression

(责任编辑 陈蒙腰)